

政策设计、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

——基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反馈效应分析

王培杰 彭雨馨 张友浪 *

【摘要】政策是塑造民众认知、态度和偏好的重要因素。现有政策反馈研究尚缺乏对政策设计特征如何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的讨论。论文基于1980—201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下同）的216份计划生育政策文件中的生育调节要求构建了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利用CGSS2010、2012和2013三轮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策设计特征对民众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1）“独生子女”政策设计越严格，民众对政府干预个体生育的支持度越高，民众期望的子女数量和男孩数量越低；但并未发现政策设计严格度对民众的男孩偏好有显著影响。（2）政策设计通过影响民众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生育偏好。（3）政策设计对民众的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影响会随着个体身份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而产生变化。这表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通过塑造民众的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削弱了传统的“多子多福”等观念。综上，论文补充了对政策长期反馈效应和政策设计结构性特征影响的探讨，深化了对政策塑造民众观念过程（服从——认同——内化）的讨论，也丰富了对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理解。在人口形势发生变化的当下，这启发决策者尽快建立并完善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以扭转民众观念。

【关键词】政策设计 政策反馈 生育偏好 政策认同 独生子女政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2) 05-0027-22

一、引言

科学分析和引导民众偏好是政府明确服务方向和工作重心，进而提升治理

* 王培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彭雨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张友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初稿曾在《公共行政评论》第六届青年学者论坛线上报告。感谢刘帮成和张书维两位专家的点评与建议；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委会专家和编辑部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公共服务中的‘未诉先办’模式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批准号：21XNF006）。

水平的重要基础。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不仅需要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习近平,2021),更需要能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科学引导民众期望和塑造民众偏好,进而合理规范其行为。因此,基于中国各级政府丰富而广泛的政策实践经验,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政策设计如何塑造民众的政策态度与偏好?回答该问题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加深理解宏观政策与制度对微观个体政策态度与偏好的影响,也有助于科学总结实践规律,评估和预测政策长期执行产生的政治效应以及对政策后续走向的影响。

政策反馈理论(Policy Feedback Theory)提供了理解政策塑造民众偏好过程机制的重要视角。政策反馈理论提出,政策是塑造政治子系统和政治环境的重要力量(Pierson,1993)。民众作为子系统内的重要参与者,其认知、态度与偏好会受过往和当前政策的影响。而且,政策对大众的影响(即公众反馈效应)是政策反馈效应最重要的政治后果之一(Campbell,2012)。政策设计是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政策设计规定的程序与规则和资源分配方式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大众的态度与行为(Mettler,2002;Pierson,1993;Soss,1999)。现有研究发现,政策设计的内容差异会导致公众反馈效应存在差异(Barabas,2009;Hedegaard,2014)。那么,内容相同但特征不同的政策设计是否也会形成差异化的公众反馈效应呢?

本文以中国1980年至2013年严格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探究计划生育政策设计对民众的生育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反馈效应,并进一步识别其作用机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探究相同制度背景下同一政策领域中政策设计特征差异化影响的合适案例。第一,独生子女政策的重要性、邻近度和能见度均较高,具有产生公众反馈效应的可能性。该政策执行长达30多年,且被赋予基本国策地位。同时,各级政府构建了完善的政策体系和组织体系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生育行为,并通过各类媒介影响民众生育观念。第二,独生子女政策设计同时具有中央一以贯之的“顶层设计”和地方随时空变化的“因地制宜”两个特征,这意味着该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设计严格度存在时空差异。

本文对1980年至201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6份计划生育政策文本进行编码,依据生育调节要求构建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并利用三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2012和2013)构建混合截面数据集。接着,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和负二项回归识别了设计严格度与民众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包括偏好数量和偏好结构)的相关关系,并运用分步回归法检验了政策认同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政策设计严格度越高,民众的政策认同度(支持

政府干预其生育行为)越高,其生育偏好数量(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越低,但并未发现政策设计对生育偏好结构(男孩偏好)的影响。第二,政策设计通过影响民众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生育偏好。第三,政策设计的影响会随着民众个体身份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而产生变化。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政策反馈与生育偏好文献,指出现有研究空白;第三部分解释政策设计影响民众政策认同和政策偏好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描述本文选取的政策案例——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第五部分详细说明数据来源和实证模型;第六部分汇报基准回归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阐述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政策反馈是指“政策影响政治进而影响未来决策的过程”(Pierson, 1993)。自政策反馈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热点以来,探究政策的公众反馈效应一直是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公众反馈效应是指政策对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塑造效应(Mettler, 2002; Pierson, 1993; Zhang et al., 2022)。Mettler (2002)基于Pierson (1993)提出的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构建了公众反馈效应框架:政策设计与执行中的制度安排和资源分配会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其中,阐释效应是指政策设计规定的程序与规则以及资源分配的过程与结果向个体传递政策信息从而塑造其观念与态度的过程;资源效应是指政策通过分配资源来强化或弱化个体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Campbell, 2012; Mettler, 2002)。此后,众多学者试图基于上述机制探究各类政策领域中发生的公众反馈效应。

并非所有的政策都能产生公众反馈效应,具有较高的可见度和邻近度是其产生公众反馈效应的必要条件(Campbell, 2012; Soss & Schram, 2007)。可见度(Visibility)是指政策分配成本和收益的能见程度;邻近度(Proximity)是指政策与民众的距离,表示政策直接影响公众的可能性(Soss & Schram, 2007)。对普通民众而言,再分配型政策和管制型政策的可见度与邻近度通常较高。所以,大量公众反馈研究聚焦于福利政策领域和刑事司法领域,包括公共援助(Barnes & Hope, 2017)、医疗保险(He et al., 2020)、养老保险(郭磊, 2018; 郭磊、胡晓蒙, 2019)和住房保障(Bruch et al., 2010)等,以及司法接触(Davis, 2021)、执法歧视(Maltby, 2017)、移民监管(Cruz Nichols et al., 2018)和医闹入刑(Huang, 2021)等。

政策设计是指决策者对政策目标、工具、规则、程序和含义等方面的规定

与说明 (Ingram & Schneider, 1993; Ingram et al., 2019), 是导致公众反馈效应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 (Dolsak et al., 2020; Mettler, 2002; Soss, 1999)。但是, 现有的公众反馈实证研究要么从宏观层面入手, 检验政策投入程度或结构 (各国或地区在相同或不同政策领域中投入的资源) 对民众政治态度或行为的影响 (Dellmuth & Chalmers, 2018; Neimanns, 2020); 要么从微观层面入手, 比较政策实施后政策参与者与未参与者在政治态度与行为上的差异来识别公众反馈效应 (Mettler, 2002; Mettler & Welch, 2004)。这两种研究思路均缺乏对政策设计特征的直接分析。尽管有少数研究探讨了不同政策设计形成的差异化公众反馈效应, 例如 Barabas (2009) 对个人退休账户 (IRAs) 与健康储蓄账户 (HSAs) 设计差异的效应分析; Hedegaard (2014) 对选择性政策、普遍性政策和基于贡献的政策这三类设计的效应差异讨论。但是该类研究仍未对单一政策设计特征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

探究政策设计特征的影响既能回应上述理论问题, 也能彰显现实关切。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例, 其政策设计在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异。那么如何将这些政策设计的时空差异概念化, 并进一步分析其对民众生育观念的影响呢? 分析这类问题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廓清政策设计特征对公众反馈效应的影响, 丰富政策反馈研究的分析视角, 深化对长期反馈效应机制的理解, 也有助于在实践上增进对统筹“顶层设计”和“因地制宜”产生差异化效应的认识, 从而为下一步科学决策提供指导。

鉴于本文试图分析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特征对民众生育偏好的影响, 下文将简要总结针对民众生育偏好的研究。生育偏好是指个体的生育需求和意愿, 常用理想子女数或意愿子女数衡量 (Bongaarts, 1990)。影响生育偏好的因素包括三类: 一是个体特征, 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 (如年龄、教育、性别等) 和个体认知因素 (何兴邦等, 2017; Miller & Pasta, 1993); 二是家庭特征, 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和经济状况等因素, 另外, 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效应和示范效应以及经济支持都可能影响个体生育偏好 (李婉鑫等, 2021; 黄静、李春丽, 2022; 王晶、杨小科, 2017; Murphy, 2012); 三是环境情境, 涉及国家的政策体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各方面, 例如生育政策转变 (风笑天, 2018)、养老模式变化 (王国军、高立飞, 2021)、医疗保险扩面 (王天宇、彭晓博, 2015)、教育体系进步 (Bongaarts, 2020) 和户籍制度调整 (杨华磊等, 2018) 等。

尽管现有研究对影响民众生育偏好的因素基本达成了共识, 但是都未直接探究生育政策的影响。部分学者尝试通过两种方式间接地识别生育政策效应: 一是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为背景, 分析新政策下个体的生育偏好状况及其变

化（石智雷等，2022）；二是以政策实施后果为背景，比较不同群体（例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家庭等）的生育偏好差异（于潇、梁嘉宁，2021；张晓青等，2016）。这两类研究均未直接讨论生育政策设计是否以及如何塑造民众的生育观念，更缺乏对生育政策设计特征的关注，而政策反馈理论则为我们从政策过程视角深化理解生育政策如何在长时间内影响民众生育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理论机制

本研究关注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特征：设计严格度，即核心要求程度越高，设计越严格。从具体研究角度看，设计严格度是“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在“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政策目标指引下，生育调节要求是该政策设计的核心内容，直接反映出其设计严格度。同时，在中央明确“严格一孩”的总体要求下，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对生育调节要求进行调整，这使得设计严格度呈现出时空差异。因此，设计严格度可能是影响生育政策反馈效应的关键因素。从一般性角度看，设计严格度是体现管制型政策设计的核心要求程度的关键特征。决策者常通过制定更为严格或宽松的政策来加强或减弱对民众态度与行为的约束。这常见于环境保护（Demiral et al.，2021）、交通管制（Fei et al.，2020）、金融监管（Lee & Chih，2013）、出入境管理（Massey & Pren，2012）、房地产调控（Jiang，2021）和疫情防控（Lin et al.，2021）等管制型政策领域。因此，探究政策设计严格度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管制型政策设计的公众反馈效应。

设计严格度主要通过两方面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第一，不同严格度的政策设计意味着向公众释放不同强度的政策信号。对普通公众而言，政策的一项重要意义在于传递政治信息，从而促使公众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政治观念（Lavery，2014）。比如，政策通过对某些社会行为的限制或认可来提供关于社会可接受内容的信息（Pacheco，2013）；新的社会规范信号会促使目标群体改变其态度表达（Kreitzer et al.，2014）。但是必须注意，政策信号传递并非均衡分布（Rhodes，2015）。设计严格度是影响信号传递强度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公众和媒体会对更严格的政策保持相对更高的关注度，即政策可见度更高；另一方面，更严格的政策设计会提高公众受政策约束或者与政策互动的可能性，即政策邻近度更高。因此，设计严格度通过影响政策的可见程度以及政策与公众的距离进而影响政策信号的作用强度，最终影响公众反馈效应程度。

第二，不同严格度的政策设计对公众而言也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违规风险和成本负担。通常，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包含明确的政策激励与惩罚措施。理性

的公众会先评估违规风险以及权衡成本与收益,再表达其态度或采取行动(D'arcy & Herath, 2011; Zhang et al., 2021)。如果政策设计越严格,那么公众的行为选择空间就会被压缩,其违规风险会上升。为避免潜在的违规风险与违规成本,公众会逐渐表现出与政策要求一致的态度与行为(Crossler et al., 2014; Floyd et al., 2000)。特别地,如果公众对政策的长期执行形成稳定预期,那么他们会更快速地调整他们的态度表达和行为选择以避免长期风险。这意味着政策对公众态度与行为的塑造效应将更为显著。综上,政策设计严格度差异导致信号干预强度和违规风险程度差异,进而导致公众反馈效应差异。

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例,其核心目标是控制人口数量,所以生育调节要求就是衡量其设计严格度的核心指标。自1980年至2013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基本遵从中央“独生子女”要求的基础上对生育调节要求进行了数次调整,包括增加“一孩半”“双独二孩”或“单独二孩”等要求。存在“时空差异”的生育调节要求可能导致差异化的公众反馈效应。如果生育调节要求越严格,那么政策信号对民众生育观念的干预程度越强。与此同时,面对与严格要求相配套的奖惩措施,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约束力度也越强。在长期稳定的政策塑造下,个体生育偏好会逐步与政策要求接近。另外,由于生育行为在家庭和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所以生育政策对目标群体的反馈效应还会通过代际传递机制和社会示范效应间接作用于更广泛的群体。最终,在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的双重作用下,独生子女政策形成长期反馈效应,塑造了公众的生育偏好。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政策设计严格度越高,个体的生育偏好与政策目标要求越一致。

政策塑造民众态度与偏好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历经“服从——认同——内化”的过程。在政策执行初期,个体出于违规风险和成本的考量而选择遵从政策。随着政策信号持续干预以及个体对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加深,个体逐渐趋向于认可政策对个体行为的干预以避免长期性认知失调(Olson & Stone, 2005)。最终,在政策反馈效应的作用下,个体自觉地建立起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的期望设定或价值追求。特别地,政策的长期执行为上述机制的发生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和效应上的必然性(Pacheco, 2013)。所以,长期公众反馈效应的发生机制可能是,政策设计通过塑造民众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就独生子女政策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生育信号干预和规则约束下,民众逐步接受了政府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干预,并表现出与政策目标更为一致的生育偏好(见图1)。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政策设计严格度越高,个体对政策干预的认同程度越高。

假设3:政策设计严格度通过影响个体的政策认同进而影响其生育偏好。



图1 概念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政策情境——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本研究以中国1980—2013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方面：第一，该政策具有产生长期反馈效应的足够实施时间。自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起，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立。直到2013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全面放开“单独二胎”，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束（李朔严、张克，2016）。独生子女政策实施长达30多年，其反馈效应具备充分时间显现。

第二，该政策具有产生公众反馈效应的高邻近度和高可见度特征。一方面，该政策通过严格规定“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直接限制生育数量，同时辅之以技术性工具的运用（如婚前检查、避孕技术和绝育手术等）和政策性工具的运用（如颁发准生证、独生子女光荣证，征收社会抚养费，宣传“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一个样”等）。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建立各级计划生育机构以确保该政策的实施，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委员会、学术研究机构 and 新闻媒体等，并建立起一票否决制和主要领导负责制等制度体系和计划生育法规体系。总之，完备的政策体系和机构体系从各方面将个体纳入到政策场域中。

第三，该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设计严格度）存在时空差异。总体而言，独生子女政策设计兼具中央“顶层设计”与各地“因地因时制宜”的特征。自1980年至2013年年底，在全国主要保持“独生子女”核心要求的情况下，中央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据当地人口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对生育调节要求进行局部微调。如表1和表2所示，一方面，生育调节要求存在纵向时间变化。以广东省为例，1980—1997年年底，广东省各地普遍允许农村统筹安排生育两个孩子。到21世纪初，政策趋严调整为“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面，生育调节要求存在横向空间差异。以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和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相较广东允许农村统筹安排生育二胎，河南严格要求“只生育一个子女”。另外，河南也是全国最后放开“双独二胎”的省份。综上，独生子女政策是探究单一制度下相同政策领域中不同设计特征导致公众反馈效应差异的合适案例。

表 1 广东省计划生育安排

名称	实施时间	生育调节要求	其他政策安排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1980. 02. 02	晚婚、晚育、少生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 议纪要	1982. 09. 17	晚婚、晚育、少生	一孩半（农村）
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 议纪要	1984. 06. 12	晚婚、晚育、少生	双独二孩 + 一孩半（农村）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1986 修订）	1986. 05. 17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 + 统筹安排生育 两个（农村）
.....			
《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 （1998 修订）	1998. 01. 04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 + 一孩半（农村）
.....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2014 修正）	2014. 03. 27	独生子女	单独二孩 + 一孩半（农村）

资料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10 网法规库。限于篇幅原因，部分计划生育条例未在表格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表 2 河南省计划生育安排

名称	实施时间	生育调节要求	其他政策安排
《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 暂行规定》	1981. 07	独生子女	
《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 育工作的通知》	1984. 05. 07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农村）
《河南省计划生育条例》	1990. 07. 01	独生子女	一孩半（农村）
.....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2011 修正）	2011. 11. 25	独生子女	双独二孩 + 一孩半（农村）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2014 修正）	2014. 06. 03	独生子女	单独二孩 + 一孩半（农村）

资料来源：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10 网法规库。限于篇幅原因，部分计划生育条例未在表格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五、数据来源与分析模型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检验政策设计严格度 ($policy_strictness_{it}$) 对民众生育政策的认同 ($policy_support_{it}$) (见公式 1) 和生育偏好 ($fertility_preference_{it}$) (见公式 2) 的反馈效应。接着, 借鉴 Baron 和 Kenny (1986) 的设计思路, 采用分步回归法检验政策认同 ($policy_support_{it}$) 的中介效应 (见公式 3)。三组模型均加入可能影响个体生育观念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省份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X_{it}), 并加入省份固定效应 (φ_p) 和时间固定效应 (v_t), ε_{it} 是模型误差项。模型设定如下:

$$policy_support_{it} = \alpha_0 + \alpha_1 policy_strictness_{it} + \alpha_2 X_{it} + \varphi_p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fertility_preference_{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strictness_{it} + \beta_2 X_{it} + \varphi_p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fertility_preference_{it} = \gamma_0 + \gamma_1 policy_strictness_{it} + \gamma_2 policy_support_{it} + \gamma_3 X_{it} + \varphi_p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policy_support_{it}$ 表示民众对政策干预的认同, 在理想情况下, 应直接询问受访者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认同或支持程度。但是在收集各个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后, 发现只有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自 2010 年起询问过受访者对政府干预个体生育行为的态度: “生多少孩子是个人的事, 政府不应该干涉。您同意吗?” 在 2013 年年底后, 全国生育调节要求一致调整为全面放开“单独二胎”。因此, 研究仅使用 CGSS2010、2012 和 2013 年三轮调查数据, 并基于上述问题近似测量受访者对独生子女政策干预的认同程度。回答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 1—5 分里克特量表, 对该变量进行反向编码处理。

$policy_preference_{it}$ 表示民众的生育偏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控制人口数量, 所以主要使用“期望子女数”测量个体的生育偏好。CGSS2010、2012 和 2013 三轮调查询问受访者“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 您希望有几个孩子?” 为排除异常值干扰, 参照于潇和梁嘉宁 (2021) 的做法, 本文将 6 个及以上的理想子女数进行合并, 最大值设置为 6。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生育调节要求与对汉族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剔除了少数民族样本。另外, 扭转生育性别观念 (生男生女一个样) 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目标。所以, 研究还构建了“期望男孩数”和“男孩偏好”两个变量测量个体的生育偏好结构。其中, “期望男

孩数”主要依据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希望有几个男孩进行编码,回答“无所谓男孩女孩”编码为0;“男孩偏好”为虚拟变量,将受访者明确回答希望有1个及以上男孩编码为1,否则为0。

2. 关键解释变量

$policy_strictness_{it}$ 表示政策设计严格度,主要通过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0—2013年间216份政策文本中的生育调节要求进行手动编码来测量。生育调节要求规定了各类情况下允许个体生育的子女数。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核心内容,它最直接地体现出政策设计的严格度。具体的处理过程如表3所示,依据生育调节要求中对“统筹安排生二孩”“单独二孩”“双独二孩”“一孩半”和“严格一孩”的设定,将设计严格度划分为1—5级,级别越高则设计严格度越高。最后,使用历年设计严格度的均值作为关键自变量。政策文本以计划生育条例为主,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和110网法规库。

表3 “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设定

变量名	生育调节要求	严格程度
设计严格度	严格执行独生子女	5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	4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单独二孩	3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一孩半(农村)+单独二孩	2
	独生子女+双独二孩+允许生二胎(农村)	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 控制变量

依据文献梳理部分,本研究控制了影响民众生育偏好的三组变量,一是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居住在城镇、是否信教、是否结婚、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是否中共党员、住房面积、住房产权是否自己所有、健康状况、是否非农户籍、是否工作、是否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以及个体对当下和未来社会地位的认知,等等;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年收入、房产数量、是否有小汽车等;三是省份特征,包括人均GDP、二产和三产占比、财政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居民消费水平和总人口数等。第一、二组变量使用CGSS2010、2012和2013年三轮调查数据,第三组变量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避免不同调查轮次差异的影响,控制了2012年和2013年两个年份的虚拟变量;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自然地理特征或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表4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期望子女数	31455	2.02	0.929	0	6
期望男孩数	31608	0.857	0.71	0	6
男孩偏好	31608	0.709	0.454	0	1
政策认同度	31785	3.601	1.139	1	5
设计严格度	31871	3.152	0.603	1	4.117
住在城镇	31871	0.614	0.487	0	1
女性	31871	0.499	0.5	0	1
年龄	31868	46.761	16.135	14	96
信教	31865	0.033	0.18	0	1
受教育程度	31864	2.251	1.243	1	5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28288	8.467	3.135	0	16.118
中共党员	31774	0.117	0.322	0	1
住房面积（平方米）	31426	109.378	79.557	4	1000
住房产权自己所有	31795	0.497	0.5	0	1
健康状况	31854	3.625	1.091	1	5
非农户籍	31868	0.478	0.5	0	1
有工作	31865	0.404	0.491	0	1
医疗保险	31674	0.886	0.317	0	1
养老保险	31128	0.603	0.489	0	1
现在的阶层认同	31741	4.174	1.702	1	10
10年后的阶层认同	31238	5.214	2.076	1	10
结婚	31847	0.899	0.302	0	1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27945	10.241	1.347	0	16.118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31721	1.102	0.556	0	10
家庭有小汽车	31828	0.141	0.348	0	1
人均GDP（万元）	31871	4.523	2.158	1.312	10.01
三产占比（%）	31871	42.984	10.164	30.7	79.5
二产占比（%）	31871	47.725	7.983	19.7	60.1

(续上表)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财政支出 (百亿元)	31871	38.288	15.509	5.575	84.11
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31871	95.914	80.696	0.611	357.596
居民消费水平 (千元)	31871	15.59	8.149	5.879	40.27
总人口数 (百万)	31871	53.185	26.666	5.63	106.44
2012 年	31871	0.337	0.473	0	1
2013 年	31871	0.328	0.47	0	1

注：剔除少数民族样本，将大于6的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合并为6。将大于1000的住房面积合并为1000。对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进行取对数处理。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等1-5级。健康状况为1-5级，数值越大表明越健康。阶层认同为1-10分，分值越大表明自我认为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省份特征变量经过匹配处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六、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

表5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总体上支持了上述三个假设，并得出一些新发现。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为政策认同，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3)和模型(4)的因变量为理想子女数，采用负二项回归，其中模型(4)检验了政策认同的中介效应。与模型(2)相比，模型(1)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以此检验模型系数是否存在因为统计“分隔”(separation，即虚拟变量过多几近完美预测因变量)导致估计系数过大或过小的问题(Rainey, 2016)。所有模型均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三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设计严格度与个体的政策认同显著正相关，与个体的期望子女数显著负相关：设计严格度增加1个单位，个体支持政府对其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至少增长7.3% ($p < 0.01$) (模型2中的优势比过大，应是统计“分隔”导致的估计偏误)，个体的期望子女数发生率比率预计会减少33.6% ($p < 0.1$)。而且，政策认同的中介效应也得到支持($p < 0.01$)。进一步地，本文采用R语言中的Rmediation (Tofighi & MacKinnon, 2011) 程序包计算政策认同的置信区间，95%的置信区间为(-0.0019479799, -0.0006004261)，这再次支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

表 5 对民众生育偏好数量的影响

变量名	政策认同		期望子女数	
	(1)	(2)	(3)	(4)
	ologit OR (S. E.)	ologit OR (S. E.)	nbreg IRR (S. E.)	nbreg IRR (S. E.)
政策认同				0.983 *** (0.00)
设计严格度	1.073 *** (0.02)	80.481 *** (85.20)	0.664 * (0.16)	0.700 (0.17)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nalpha			0.000 (0.00)	0.000 (0.00)
常数项			1.348 (1.58)	1.155 (1.35)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916	24916	24744	24704
Pseudo R2	0.0129	0.0262	0.0230	0.0232
AIC	67955.47	67102.64	70435.37	70298.1
BIC	68231.66	67614.4	70922.35	70793.1
Wald chi2 (df)	840.32 (30)	1663.97 (59)	3952.23 (59)	4000.81 (60)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OR 表示 Odds Ratio，IRR 表示 Incidence Rate Ratio。***、** 和 *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除严格控制生育子女数量外，独生子女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倡导是“生男生女一个样”。各级计划生育机构一方面通过宣传“生男生女一个样”，试图扭转民众生育男孩的偏好；另一方面通过严厉打击非法胎儿鉴定、非法人工终止妊娠、溺婴和弃婴等违法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抑制民众生育男孩的偏好。在“软倡导”和“硬约束”的长期作用下，民众的生育偏好结构可能发生改变。在表 6 中，将因变量分别替换为期望男孩数和男孩偏好。鉴于前文所提到的统计“分隔”，接下来的逻辑模型将不再加入省级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设计严格度增加 1 个单位，个体的期望男孩数发生率比率预计会减少 87.1%；当个体对政

府干预生育行为表示认同时,其期望男孩数发生率比率预计会减少3.5% [见表6模型(1)、模型(2)]。在模型(3)、模型(4)中,设计严格度系数不显著,表明并未发现政策设计严格度对个体男孩偏好有影响。

表6 对民众生育偏好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期望男孩数		男孩偏好	
	(1)	(2)	(3)	(4)
	nbreg IRR (S. E.)	nbreg IRR (S. E.)	logit OR (S. E.)	logit OR (S. E.)
政策认同		0.965 *** (0.00)		0.928 *** (0.01)
设计严格度	0.129 *** (0.06)	0.140 *** (0.06)	0.981 (0.03)	0.983 (0.03)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nalpha	0.000 (0.00)	0.000 (0.00)		
常数项	32.636 (74.35)	26.673 (60.67)	0.018 *** (0.01)	0.020 *** (0.01)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24826	24786	24826	24786
Pseudo R2	0.0296	0.0302	0.0360	0.0371
AIC	52926.24	52799.97	28973.05	28896.87
BIC	53413.42	53295.17	29224.76	29156.64
Wald chi2 (df)	2994.44 (59)	3063.62 (60)	1057.70 (30)	1081.74 (31)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OR表示Odds Ratio,IRR表示Incidence Rate Ratio。***、**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0.01、0.05和0.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城乡异质性

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城乡差异可能导致反馈效应差异化。城乡二元管理体制长期影响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陆益龙,2008),进而可能影响政策的公众反馈效应。下面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设计严格度与非农户籍的交互项以识别户籍类

型对政策设计效应的影响。对生育偏好数量的检验结果如表 7 模型（1）至模型（3）所示，设计严格度与非农户籍的交互项在三个模型中均显著，表明设计严格度增加，相比非农户籍群体，政策设计对政策认同的正面效应和对期望子女数的负面效应在农业户籍群体中更强。对生育偏好结构的检验结果如模型（4）至模型（7）所示，设计严格度与个体的期望男孩数负相关，交互项（设计严格度与非农户籍）与个体的期望男孩数正相关。这表明设计严格度增加，相比非农户籍群体，农业户籍群体期望男孩数发生率比率下降更多。另外，回归结果仍未发现设计严格度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综上，政策设计对个体政策认同、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的反馈效应存在城乡差异，而且对农业户籍群体的反馈效应更强。

表 7 对民众生育偏好数量的影响

变量名	生育偏好数量			生育偏好结构			
	政策认同	期望子女数		期望男孩数		男孩偏好	
	(1)	(2)	(3)	(4)	(5)	(6)	(7)
	ologit	nbreg	nbreg	nbreg	nbreg	logit	logit
	OR (S. E.)	IRR (S. E.)	IRR (S. E.)	IRR (S. E.)	IRR (S. E.)	OR (S. E.)	OR (S. E.)
政策认同			0.983 ***		0.965 ***		0.928 ***
设计严格度	1.107 ***	0.654 *	0.690	0.126 ***	0.137 ***	0.968	0.971
设计严格度 × 非农户籍	0.922 *	1.023 **	1.022 **	1.037 *	1.037 *	1.033	1.030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nalpha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1.396	1.194	34.481	28.088	0.018 ***	0.021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24916	24744	24704	24826	24786	24826	24786
Pseudo R2	0.0130	0.0230	0.0232	0.0297	0.0302	0.0360	0.0371

注：OR 表示 Odds Ratio，IRR 表示 Incidence Rate Ratio。***、** 和 *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尾）。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基于“少数民族”样本的安慰剂检验

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民族差异也可能导致反馈效应差异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育调节要求明确区分民族差异，即汉族人口适用独生子女要求，少数民族人口被允许生育二胎及以上数量。因此，预计独生子女政策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反馈效应微弱。下面以 CGSS2010、2012 和 2013 三轮调查中的少数民族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对少数民族群体生育偏好数量和生育偏好结构的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模型（1）中设计严格度与民众的政策认同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设计严格度增加 1 个单位，个体支持政府对其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至少降低 25.2%（ $p < 0.01$ ）。这表明在针对汉族人口的生育调节要求越严格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反而更不认同政府对其生育行为进行干预。模型（2）、模型（3）中设计严格度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表明其与少数民族个体的期望子女数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模型（4）至模型（7）的结果也表明设计严格度与少数民族个体的期望男孩数和男孩偏好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支持了上述设想。

表 8 对少数民族群体生育偏好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生育偏好数量			生育偏好结构			
	政策认同	期望子女数		期望男孩数		男孩偏好	
	(1)	(2)	(3)	(4)	(5)	(6)	(7)
	ologit	nbreg	nbreg	nbreg	nbreg	logit	logit
	OR	IRR	IRR	IRR	IRR	OR	OR
	(S. E.)	(S. E.)	(S. E.)	(S. E.)	(S. E.)	(S. E.)	(S. E.)
政策认同			0.979 ***		0.955 ***		0.892 **
设计严格度	0.748 ***	0.555	0.522	0.580	0.491	0.981	0.96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级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nalpha		0.000	0.000	0.000	0.000		
常数项		0.185	0.244	0.028	0.050	0.243	0.441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观测值	2312	2314	2306	2314	2305	2314	2305
Pseudo R2	0.0467	0.0494	0.0501	0.0642	0.0656	0.0533	0.0562

注：OR 表示 Odds Ratio，IRR 表示 Incidence Rate Ratio。***、** 和 * 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 0.01、0.05 和 0.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双尾）。限于篇幅原因，标准误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七、结论与讨论

基于政策反馈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1980—2013年年底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民众生育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贡献如下：第一，在政策反馈理论方面，发现政策设计越严格，目标群体的个体政策认同程度越高，其偏好与政策要求也越一致。而且，政策设计通过塑造个体的政策态度影响其偏好水平。此外，政策设计的反馈效应也会随个体身份差异（例如城乡差异和民族差异）发生变化。总之，在中国单一制度情境下，对生育政策设计特征导致的差异化反馈效应的探究，增进了对政策设计如何影响反馈效应的理解，深化了对长期反馈作用机制（服从——认同——内化）的认识，也丰富了对不同国家情境和不同政策领域中反馈效应的探究。另外，就适用性而言，设计严格度是管制型政策设计的核心特征，因此本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其他管制型政策设计对民众的长期反馈效应。但是，对于那些旨在向民众提供福利而非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政策（例如各类福利政策）而言，本研究对于设计严格度的讨论可能不再适用。未来可继续探究不同类型政策设计的不同特征对反馈效应的影响，也可探索政策反馈效应的路径机制，例如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外部政治效能感进而影响其政治态度和行为（Jacobs et al., 2021）。

第二，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首先，发现设计严格度与民众的期望子女数负相关。这表明，民众已逐步接受政府对其生育行为的干预，并适应性地调整其生育偏好以契合政策要求。这支持了部分人口学者的判断：计划生育不仅会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还会塑造其生育观念（风笑天、张青松，2002；石贝贝等，2017）。其次，发现设计严格度与民众的期望男孩数负相关，但与民众男孩偏好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表明虽然计划生育政策扭转了民众“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但是并不能说明该政策对民众“儿女双全”观念有显著改变作用。可见，相比生育偏好数量，民众的生育偏好结构更难被政策改变（风笑天、张青松，2002；贾志科、吕红平，2012）。最后，还发现独生子女政策对农业户籍群体的反馈效应更强。因为非农户籍个体的期望子女数和期望男孩数长期低于农业户籍个体（侯佳伟等，2014；姚从容等，2010），所以政策对非农户籍群体的反馈效应可能存在“天花板效应”。总之，区别于使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发展出的理性行动理论、社会网络理论（Kohler et al., 2001）、生育经济理论（Becker, 1960）、代际传递理论（Anderton et al., 1987）、计划行为理

论 (Morgan & Bachrach, 2011) 和偏好理论 (Hakim, 2000) 等, 本文从政策过程视角为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新发现。未来可从如何扭转生育偏好结构角度出发, 探究计划生育政策对改变女性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影响。

第三, 在实践启示方面, 研究表明, 经过历时 30 多年的政策实施, 独生子女政策已深刻塑造了民众的政策态度和生育观念。这启示决策者: 当上个时期的政策观念已深入人心时, 放松政策限制或进行局部政策激励产生的长期效果有限。这与人口学者对近年来数次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论断一致: 短期来看, “单独二孩” “全面二孩” 和 “全面三孩” 能产生正向的生育反弹效应; 长期来看, 受婚育观念变迁影响, 上述政策的政策效应有限 (王广州, 2017)。基于长期公众反馈效应的形成机制, 为应对潜在的人口结构危机 (“少子老龄化” 和 “性别结构失调”), 新时期建立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应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应自觉承担起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主体责任。在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下, 民众在心理上已认同政府对其生育行为的干预。这种心理会延续到下一个时期, 影响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 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政策宣传, 通过营造鼓励生育的政策氛围继续增强民众的政策认同; 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提供和改善生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以回应民众期望。2022 年 8 月 16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7 个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 要求 “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从明确政策导向到构建政策体系, 鼓励生育的国家行动正稳步前进。当然, 考虑到新政策体系建立和反馈效应形成时间, 以及再分配政策 (鼓励生育) 与管制型政策 (计划生育) 的作用机制差异, 推动民众生育观念再次转变的过程或许是漫长的。二是继续保持中央统筹 “顶层设计” 与地方 “因时因地” 制宜的政策设计安排。既要充分发挥好中央统筹全局的能力, 自上而下建立起覆盖生育政策宣传、生育补贴与奖励和妇幼保健服务等各项措施的统一的政策体系, 又要充分尊重各地方客观实际, 允许地方政府依据本地人口结构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自主调整相关政策, 比如生育奖励标准和产假延长时间等。

该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其一, 虽然本文已在全面搜集现有公开调查数据后选择了最接近的问题, 但相比直接询问民众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态度, 文中使用的政策认同测量方式并不完美,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对生育政策认同的测量方式; 其二, 虽然本文已在模型中尽可能地纳入影响民众生育观念的三组控制变量, 并控制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以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但使用截面数据仍然无法完美识别因果效应和准确估计反馈效应的绝对值。本研究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 但是在生育政策迎来方向性调整的当下, 及时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在

多个维度上的社会效应十分必要。未来研究可以就民众的生育政策态度进行连续追踪调查,继续深入探究政策调整对个体生育观念的影响,还可以就中国情境继续探究其他政策领域的反馈效应。

参考文献

- 风笑天 (2018). 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探索与争鸣, 10: 54-61+142.
- Feng, X. T. (2018). What'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sire to Have the Second Child in the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10: 54-61+142. (in Chinese)
- 风笑天、张青松 (2002).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市场与人口分析, 5: 21-31.
- Feng, X. T., & Zhang, Q. S. (2002).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Fertility Desire among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5: 21-31. (in Chinese)
- 郭磊 (2018). 基本养老保险挤出了企业年金吗——基于政策反馈理论的实证研究. 社会保障评论, 1: 65-81.
- Guo, L. (2018). Does Basic Pension Crowd out Enterprise Annu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olicy Feedback Theory.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Review*, 1: 65-81. (in Chinese)
- 郭磊、胡晓蒙 (2019). 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内部影响: 促进还是抑制?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4: 97-105.
- Guo, L., & Hu, X. M. (2019). The Internal Influence of China's Multi-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Promotion or Restraint?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97-105. (in Chinese)
- 何兴邦、王学义、周葵 (2017). 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 CGSS(2013) 的经验证据. 西北人口, 2: 31-38+53.
- He, X. B., Wang, X. Y., & Zhou, K. (2017). The Concept of "Raising Sons for Old Age" and Rural Youth's Fertility Desi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GSS(2013).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 31-38+53. (in Chinese)
- 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孙铃、张红川、窦东徽 (2014).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 中国社会科学, 4: 78-97+206.
- Hou, J. W., Huang, S. L., Xin, Z. Q., Sun, L., Zhang, H. C., & Dou, D. H. (2014). A Change in the Desired Fertil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1980-2011.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78-97+206. (in Chinese)
- 黄静、李春丽 (2022). 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4: 37-54+196.
- Huang, J., & Li, C. L. (2022).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on a Family's Willingness t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 37-54+196. (in Chinese)
- 贾志科、吕红平 (2012).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人口学刊, 4: 34-45.
- Jia, Z. K., & Lyu, H. P. (2012). Study on Differentiation Changes of Fertility Desire Behind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Population Journal*, 4: 34-45. (in Chinese)
- 李朔严、张克 (2016).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研究(1956—2015)——基于间断均衡模型的视角.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4: 32-42.
- Li, S. Y., & Zhang, K. (2016). A Case Study of the One-Child Policy Change in China(1956-2015): A Punctuated-Equilibrium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4: 32-42. (in Chinese)
- 李婉鑫、杨小军、杨雪燕 (2021). 儿童照料支持与二孩生育意愿——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研究, 5: 64-78.
- Li, W. X., Yang, X. J., & Yang, X. Y. (2021). Child Care and the Desire to Have the Second Child: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2017 National Fertility Survey. *Population Research*, 5: 64-78. (in Chinese)
- 陆益龙 (2008).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 1: 149-162+207-208.
- Lu, Y. L. (2008). Does Hukou still Matter?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149-162+207-208. (in Chinese)
- 石贝贝、唐代盛、侯茵 (2017).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人口学刊, 2: 28-36.
- Shi, B. B., Tang, D. S., & Hou, L. (2017). The Study on Fertility Desire and Sex Preference in China. *Population Journal*, 2: 28-36. (in Chinese)
- 石智雷、邵玺、王璋、郑州丽 (2022).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 人口学刊, 3: 1-18.

- Shi, Z. L., Shao, X., Wang, Z., & Zheng, Z. L. (2022). A Study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under the Three-Child Policy. *Population Journal*, 3: 1–18. (in Chinese)
- 王广州 (2017). 生育政策调整目标人群总量与预期效果再检验. *人口学刊*, 6: 5–16.
- Wang, G. Z. (2017). Total Population of Adjustment Target of Fertility Policy and Re-checking of Expected Policy Effect. *Population Journal*, 6: 5–16. (in Chinese)
- 王国军、高立飞 (2021). 低生育意愿的一个解释: 养儿防老向商业保险养老转变——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分析. *兰州学刊*, 2: 179–195.
- Wang, G. J., & Gao, L. F. (2021). An Explanation for the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aising Children for the Aged to Purchasing Commercial Insurance for the Ag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5.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 179–195. (in Chinese)
- 王晶、杨小科 (2017).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2: 140–155 + 196.
- Wang, J., & Yang, X. K. (2017). A Study of the Division of Family Care and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he Second Chil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140–155 + 196. (in Chinese)
- 王天宇、彭晓博 (2015). 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经济研究*, 2: 103–117.
- Wang, T. Y., & Peng, X. B. (2015).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Fertility Desire: Evidence from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 103–117. (in Chinese)
- 习近平 (2021).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人大*, 13: 14–15.
- Xi, J. P. (2021). The Speech at the July 1 Medal Presentation Ceremony.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13: 14–15. (in Chinese)
- 杨华磊、吴义根、张冰鑫 (2018). 城镇化、外部性与生育水平. *人口与发展*, 4: 48–55.
- Yang, H. L., Wu, Y. G., & Zhang, B. X. (2018). Urbanization, Externality and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4: 48–55. (in Chinese)
- 姚从容、吴帆、李建民 (2010).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 2000–2008. *人口学刊*, 2: 17–22.
- Yao, C. R., Wu, F., & Li, J. M. (2010). Review of Fertility Desire Investigation among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from 2000 to 2008. *Population Journal*, 2: 17–22. (in Chinese)
- 于潇、梁嘉宁 (2021). 中国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代际传递视角. *浙江社会科学*, 11: 80–89 + 97 + 158–159.
- Yu, X., & Liang, J. N. (2020). A Study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Only Child in China: Ba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ertilit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1: 80–89 + 97 + 158–159. (in Chinese)
-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 (2016). “单独二胎”与“全面二胎”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人口研究*, 1: 87–97.
- Zhang, X. Q., Huang, C. H., Zhang, Q., Chen, S. S., & Fan, Q. P. (2016). Fertility Intention for the Second Child under the Selective and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ies: Comparisons and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Research*, 1: 87–97. (in Chinese)
- Anderton, D. L., Tsuya, N. O., Bean, L. L., & Mineau, G. P. (1987).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ve Fertility and Life Course Patterns. *Demography*, 467–480.
- Barabas, J. (2009). Not the Next IRA: How Health Savings Accounts Shape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Law*, 34(2): 181–217.
- Barnes, C. Y., & Hope, E. C. (2017). Means-Tested Public Assistance Programs and Adolescen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Youth Adolesc.*, 46(7): 1611–1621.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
- Becker, G. S. (1960).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p. 209–24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ngaarts, J. (1990). The Measurement of Wanted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3): 487–506.
- Bongaarts, J. (2020). Trends in Fertility and Fertility Preference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Roles of Educ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Genus*, 76(1): 1–15.
- Bruch, S. K., Ferree, M. M., & Soss, J. (2010). From Policy to Po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2): 205–226.
- Campbell, A. L. (2012). Policy Makes Mass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 333–351.

- Crossler, R. E. , Long, J. H. , Loraas, T. M. , & Trinkle, B. S. (2014). Understanding Compliance with Bring Your Own Device Policies Utilizing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Bridging the Intention-behavior Gap.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8(1) : 209 – 226.
- Cruz Nichols, V. , LeBrón, A. M. , & Pedraza, F. I. (2018). Spillover Effects: Immigrant Policing and Government Skepticism in Matters of Health for Latino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8(3) : 432 – 443.
- D'arcy, J. , & Herath, T. (2011).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Deterrence Theory in the IS Security Literature: Making Sense of the Disparate Finding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6) : 643 – 658.
- Davis, B. R. (2021). Feeling Politics: Carceral Contact, Well-Being, and Particip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9(2) : 591 – 615.
- Dellmuth, L. M. , & Chalmers, A. W. (2018). All Spending Is not Equal: European Union Public Spending, Policy Feedback and Citizens' Support for the EU.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7(1) : 3 – 23.
- Demiral, M. , Akça, E. E. , & Tekin, I. (2021). Predictors of Glob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Do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Matter?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3(12) : 18337 – 18361.
- Dolsak, N. , Adolph, C. , & Prakash, A. (2020). Policy Design and Public Support for Carbon Tax: Evidence from a 2018 US National Online Survey Experi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98(4) : 905 – 921.
- Fei, G. , Li, X. , Sun, Q. , Qian, Y. , Stallones, L. , Xiang, H. , & Zhang, X. (2020).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the Crimin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of Drunk Driving in China: An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Analysis, 2004 – 2017.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144: 105670.
- Floyd, D. L. , Prentice-Dunn, S. , & Rogers, R. W. (2000).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on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2) : 407 – 429.
- Hakim, C. (2000). *Work-lifestyle Cho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Preference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 A. J. , Ratigan, K. , & Qian, J. (2020). Attitudinal Feedback Towards Sub-national Social Policy: A Comparison of Popular Support for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3(3) : 350 – 371.
- Hedegaard, T. F. (2014). The Policy Design Effect: Proximity as a Micro-level Explanation of the Effect of Policy Designs on Social Benefit Attitude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7(4) : 366 – 384.
- Huang, X. (2021). Peace in the Shadow of Unrest: Yinao and the State Respons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47: 724 – 748.
- Ingram, H. , & Schneider, A. (1993). Constructing Citizenship: The Subtle Messages of Policy Design. *Public Policy for Democracy*, 68 – 94.
- Ingram, H. , Schneider, A. L. , & DeLeon, P. (2019).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Design.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pp. 93 – 126). Routledge.
- Jacobs, L. R. , Mettler, S. , & Zhu, L. (2021). The Pathways of Policy Feedback: How Health Reform Influences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articipa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50(3) : 483 – 506.
- Jiang, J. (2021). Can Real Estate Regulatory Policies Constrain Real Estate Risks to Bank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9(1) : 35 – 53.
- Kohler, H. P. , Behrman, J. R. , & Watkins, S. C. (2001). The Densit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Fertility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South Nyanza District, Kenya. *Demography*, 38(1) : 43 – 58.
- Kreitzer, R. J. , Hamilton, A. J. , & Tolbert, C. J. (2014). Does Policy Adoption Change Opinions on Minority Rights? The Effects of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7(4) : 795 – 808.
- Lavery, L. (2014). Parents as Participants: Policy Design to Inform and Empower.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2(6) : 1010 – 1033.
- Lee, T. H. , & Chih, S. H. (2013). Does Financial Regulation Affect the Profit Efficiency and Risk of Banks? Evidence from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6: 705 – 724.
- Lin, R. , Lin, S. , Yan, N. , & Huang, J. (2021). D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ork? Evidence from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China. *Cities*, 118: 103347.
- Maltby, E. (2017).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Racial Inequalit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0(3) : 535 – 548.
- Massey, D. S. , & Pren, K. A. (2012).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US Immigration Policy: Explaining the Post-1965 Surge from Latin Americ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8(1) : 1 – 29.

- Mettler, S. (2002).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o Civic Engagement: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f the GI Bill for World War II Vetera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2): 351 – 365.
- Mettler, S., & Welch, E. (2004). Civic Generation: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f the GI Bill on Political Involvement over the Life Cour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3): 497 – 518.
- Miller, W. B., & Pasta, D. J. (1993). Motivational and Nonmotiv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ld-Number Desir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5(2): 113 – 138.
- Morgan, S. P., & Bachrach, C. A. (2011). Is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n Appropriate Model for Human Fertilit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9: 11 – 18.
- Murphy, M. (2012). Intergenerational Fertility Cor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Developing Coun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24(5): 696 – 704.
- Neimanns, E. (2020). Unequal Benefits-Diverging Attitudes? Analysing the Effects of an Unequal Expansion of Childcare Provision on Attitudes Towards Maternal Employment Across 18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41(2): 251 – 276.
- Olson, J. M., & Stone, J. (2005). The Influence of Behavior on Attitudes. In D. Albarracín, B. T. Johnson, & M. P. Zanna (Eds.) *The handbook of attitudes* (pp. 223 – 271).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Pacheco, J. (2013). Attitudinal Policy Feedback and Public Opinion: The Impact of Smoking Bans on Attitudes Towards Smokers, Secondhand Smoke, and Antismoking Polic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7(3): 714 – 734.
- Pierson, P. (1993). When Effect Becomes Cause: Policy Feedback and Political Change. *World Politics*, 45: 595 – 628.
- Rainey, C. (2016). Dealing with Separation i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Political Analysis*, 24(3): 339 – 355.
- Rhodes, J. H. (2015). Learning Citizenship? How State Education Reforms Affect Parent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Political Behavior*, 37(1): 181 – 220.
- Soss, J. (1999). Lessons of Welfare: Policy Design, Political Learning, and Politica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2): 363 – 380.
- Soss, J., & Schram, S. F. (2007). A Public Transformed? Welfare Reform as Policy Feedbac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1): 111 – 127.
- Tofighi, D., & MacKinnon, D. P. (2011). RMediation: An R Package for Mediation Analysis Confidence Interva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3(3): 692 – 700.
- Zhang, Y., Teodoro, M. P., & Switzer, D. (2021). Public Water Waste Reporting: Contextual Correlates and Conservation Outcomes.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57(4): e2020WR027805.
- Zhang, Y., Wang, Q., & Zhao, M. (2022). Negativity Bias in Welfare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on Mass Publics. *Governance*. Retrieved fr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gove.12718>.

责任编辑：张书维